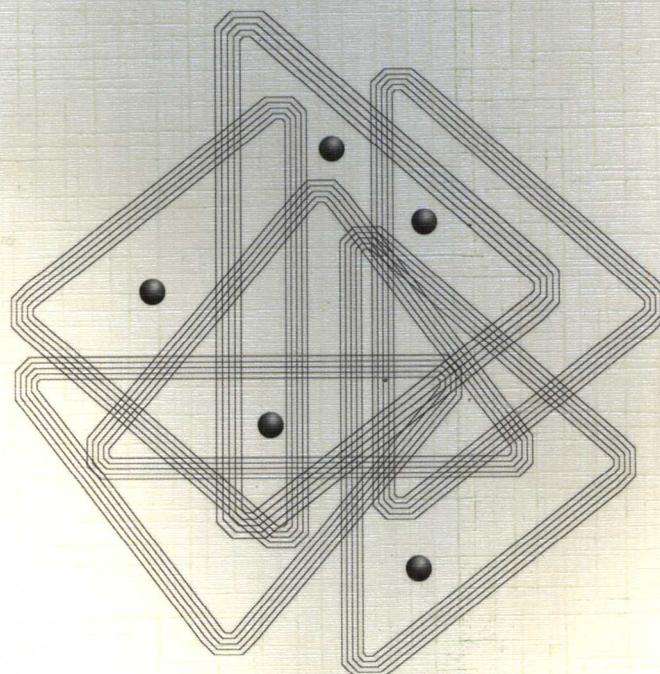


◎ 刘育民 卢羨文 主编

高考综合能力测试

研究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考综合能力测试研究

刘育民 卢羨文 主编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考综合能力测试研究/刘育民，卢羨文主编.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9

ISBN 7 - 5361 - 3413 - 4

I . 高… II . ①刘…②卢… III . 高等学校 - 入学考试 - 研究 - 中国
IV . G632. 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9665 号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

邮编：510500 营销电话：(020) 87553335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 毫米×1 092 毫米 1/16 印张：12 字数：215 千字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2 300 册

定价：25.00 元

序

考试不是与人类社会同时产生的，而是当人类社会出现了分工主要是脑体分工之后，经过长期实践的探索，人类才创造了考试。

早在约公元前 22 世纪，尧选舜做接班人，就是用“试”的方法，即在实践中、试用中考察。其方法有：妻二女，和五典，入百官，宾四门，以至入山林川泽，经暴风雷雨，历时三年，才作出决定。

但当时选官不能人人、事事都通过实践、试用来考察。公元前 178 年至公元前 134 年，汉文帝、汉武帝“对策”贤良方正，就是把自己在执政中遇到的困难，提炼为“策”（试题），要贤良方正回答（“对”），从而选拔了晁错、董仲舒等卓越人才。汉文帝、汉武帝已不像尧选舜一样，通过“试”用的实践，历时三年，而是从自己执政的实践中提炼出试题，通过一种“模拟”的实践，来测验对方的才能。当时的“对策”、“策问”还带有明显的政策咨询的性质，却开创了考试（方法）之先河。

上述历史证明，考试的方法是从实践经验中提炼出来的，是一种模拟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考试的方法愈接近实践就愈真实、准确。

但是，模拟的实践并不是真实的实践，科举考试诞生之后，日益脱离实际，已不具备政策咨询的作用，甚至成了一些人做官的敲门砖。在这里，我引述一段真实的历史，以为考试工作的借鉴。

朱元璋出身贫寒，身经百战，得天下后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人才，洪武三年（1370）即诏行科举，“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考过三年之后，朱元璋大失所望，于洪武六年（1374）却诏停科举：“朕设科举以求天才贤才，务得经明行修、文质相称之士，以资任用。今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词若可与有为，及试用之，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朕以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今各处科举，宜暂停罢。别令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庶几天才学者知所向方，而士习归于

务本。”^①

朱元璋真心实意地希望通过科举考试以求天下贤才，但所取多是少年书生，看他们的文章似乎可以有所作为，但经过实际工作之后，真正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者“甚寡”。朱元璋大有受骗上当的感觉，一怒之下，停罢科举。朱元璋以为是人们故意欺骗他，其实，这是自科举诞生后不久，至少在晚唐以后，“明经以帖诵为功”，进士科专攻诗赋“尤为浮薄”，脱离实际已成为科举考试的一大弊病，这也是北宋近两百年反复争论，连王安石这样伟大的改革家也未能解决的一大问题。作为皇帝，朱元璋是第一个最明确、深刻揭露科举考试这一弊病的人。然而，遗憾的是，他没有继续研究解决这一问题，却求助于早已被历史证明弊病更多、更大的察举。他的失败是必然的。罢科举十年后，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只好恢复科举，并且沿着王安石的思路作出了考八股文的重大决定。他所痛恨的科举考试脱离实际的弊病却依然如故，而且经明清两代，愈演愈烈，最终导致科举失败。科举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考试内部而论，主要在于它内容落后、片面，形式僵化，房刻（复习资料）泛滥，所选拔的人才孤陋寡闻，不能解决晚清面临的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不能解决中国怎样从农耕社会、自然经济转入工业社会、市场经济的问题，或转入近代化的问题。

1949 年以后，毛泽东多次批评学校的考试脱离实际，主张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文化大革命”中又废除了高考。

自 1949 年至今，高考已有 50 多年的历史。从 1977 年恢复高考，到 2007 年也有 30 年了。在 50 年或近 30 年中，可谓争论不断，大的争论差不多也是“七八年一次”。尽管争论的具体问题花样翻新，而且笔试（尤其是大规模笔试）所能考查的实际能力十分有限，但核心还是科举以来的老问题，即是考死知识，还是考能力；选拔的人是只会读书的书呆子，还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序言中，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的理论，即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都不可能消灭强制性的社会分工，不可能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等三大差别，不可能消灭人与人之间实际上不平等，他把这些称作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七九，转引自《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五卷，200 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资产阶级权利”、“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作为分工主要是脑体分工手段（方法）的考试，也是不能消灭的，尽管考试存在许多缺陷（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除非人类发明了比考试更好的方法。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只能如邓小平同志在恢复高考后所说的：“要认真研究试验，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使它完善起来。”^①

1992年，国家教委决定：“高中会考后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在改革科目设置的同时，考试内容和形式也将相应改革：在考查知识的基础上，注重考能力。”^②

什么是能力？尚未见到心理学界有一个明确的共识。迫于工作需要，我依据毛泽东实践论的认识论作如下理解：知识是前人、外人、自己过去认识世界的成果，能力是在已知知识的基础上，运用这些知识，去解决对自己来说是新的问题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品质。

高考所能考察的只是中学教学大纲范围内所能达到的能力，可以分为学科内的能力和跨学科的能力。然而，实践是不分学科的。因此，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中心的能力的考查，必然要超出某一学科的范围。1990年，时任国家教委主任的何东昌，对国家教委考试管理中心的一件关于考能力问题的请示上的批示，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要着重引导学生在相互联系中掌握知识。可以是一门课内部的联系，也可以是一门课与其他课相关知识的联系。”“如何应用这些知识？这样会不会超纲（但又不是一些教师只引导学生应考解题那种理解的‘纲’）？会考后高考科目少了，以上几点会显得更为重要。题目出好了，例如考语文，历史、政治学不好，也考不好；考数学，物理学不好，也考不好，等。”^③

碍于对如何遵循中学教学大纲的理解，1999年以前，高考只涉及学科内的能力。1999年，教育部决定高考设置“综合科目”，并对命题原则进行了重大改革：“遵循现行普通高中相关各科《教学大纲》，但不拘泥于《教学大纲》，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考查考生分析问题和

^①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4月22日），转引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② 国家教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一九九三年试行国家教委高考新科目组考试的方案》的通知（1992年12月31日），转引自《高考文献（1977—1999）》下，506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③ 何东昌对国家教委考试管理中心《关于高考历史科逐步加强能力考查的请示》的批示（1990年10月20日），转引自《高考文献（1977—1999）》下，459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利于对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①

高考设置“综合科目”的背景比较复杂，但在实施过程中，却考查了跨学科的能力，把高考长期追求的目标付诸实践，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使高考内容和形式的改革达到了新的高度。这方面突出的代表就是广东省的刘育民、卢羨文同志领导的课题组的成果《高考综合能力测试研究》，反映了广东省改革与研究的成就。这是一个古老而新鲜的课题，他们的研究成果，对高考或其他考试的改革都有重要意义。

广东省“综合能力”考试的试题，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又体现了广东省的地理特点。试题采用“主题加课题”的设计方式，以“科学实验”为中心设计了研究性学习的小课题，以学生的实验能力为重点，考查涉及生物、化学、地理、政治等多学科的知识，获得师生好评。

广东省的“综合能力”考试，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强调考生将已知的知识（不局限于某一学科）应用于新情景，分析和解决在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这样的考试，对引导学生关注实践，应用知识，培养能力，有很好的引导作用，对克服“题海战术”也有好处。

在实践中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命题“偏差”的问题，评卷误差控制的问题——特别是对有创新见解的答卷。

我和刘育民同志有30多年风雨同舟的深厚友谊。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提出应贯彻周恩来总理1972年关于中学应届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的意见，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同志也要求研究被“四人帮”破坏而停止的高等学校招生“文化考查”的问题。带着这样两个“爆炸性”的问题，1975年秋，我到广东省，就是刘育民同志和我一起去调查的。1977年，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恢复了高考。由于长期封闭，当时中国的高考严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不能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广东省率先进行了标准化考试的试验。标准化考试采用了相当数量的选择题，选择题要用机器评卷，而国产的光电阅读器刚在试制的过程中。工作量大，时间紧，机器还经常出毛病。时任广东省招生办公室副主任的刘育民和其他同志一道，夜以继日地工作。就是靠这种对事业极端负责，钻研科学，顽强奋斗的精神，广东省高考标准化

^① 教育部《关于山西、吉林、江苏、浙江省二〇〇〇年高考试行“综合科目”考试的通知》（1999年7月26日），转引自《高考文献（1977—1999）》下，655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考试取得了成功，进而推向全国，成为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高考中一件重大改革。1999 年，时任广东省高教局副局长的刘育民同志，又在广东省率先进行高考“3+X”科目改革的试验，2000 年又率先进行“综合能力”考试的试验。我和卢羨文同志共事起于高中毕业会考，当时她在广东省教育厅（高考在高教局），后来也参加到招生考试的队伍中来，是我们中间的后起之秀，又懂中学教学。她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深入研究现实问题，主持了广东省考试中心的多项研究工作。

2007 年，恢复高考就整整 30 年了。回顾高考 30 年来，许多重大改革都是“广东先行”的。30 年来，他们比别人做了更多的工作，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也作出了更大的贡献。对于广东省，对于刘育民、卢羨文以及许许多多我熟知的同志，我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和重重的感谢之情！

杨学为

2006 年 3 月

杨学为 男，1937 年生，1960 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后留校任教。1978 年调教育部，历任学生管理司招生处副处长、处长，学生管理司副司长，1987 年至 1999 年任国家教委考试中心主任，1992 年被评为研究员。1993 年被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研究员。2000 年，受聘为国家督学、教育部考试中心研究员。主持教育科学研究“七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高考标准化改革研究》，并获得一等奖，主编《中国考试文献集成》、《中国考试通史》、《中国考试改革研究》。

前 言

“3+X”高考科目改革（简称“3+X”改革）是教育部交给广东省又一项重要的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任务，是我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深化改革，不断完善，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重要内容。

一、近二十年我国高考科目的变革

高等学校招生入学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其考试科目的设置一直在争论和探索中。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设置文理两类科目，即文史类专业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理工类专业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外语。1983年，为科学地区区别中学的水平考试和高考的选拔性考试的功能，开始试行高中毕业会考，以此评价合格高中毕业生的水平。1985年，上海进行了会考与高考改革的试验，实行“3+1”高考科目编组方案，三科为语文、数学、外语，一科根据高校培养方向和专业要求，选相关科目与三科组合，共组成六个科目组。1991年，原国家教委在总结上海高考科目设置改革的基础上，在湖南、海南、云南三省试行四个不同编组的高考科目组合方案，每组四科。随后不断总结，反复论证，逐步形成了在会考基础上的“3+2”高考科目设置方案，即三门基础课（语文、数学、外语）为必考，按文、理两类各加两门科目，文史类加政治、历史，理工类加物理、化学。1995年，除上海市继续试点实行“3+1”高考科目方案外，其他省、市全部实行“3+2”高考科目设置方案。以上的高考科目设置，都有其优点和缺点。但是教育界以及社会有关方面对其缺点的评论、批评较多，集中反映在文理分科和一些科目不考，造成学生的偏科，同时考试的内容也比较僵化，创新能力的考察不够突出等。为此，教育部决定1999年在广东省进行“3+X”改革。这是高考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二、“3+X”改革方案出台的经过

前几年原国家教委就提出了高考科目改革设想，并于1996年拟让广东省在1997年进行探索实验，但由于时间紧迫，未能实行。1997年底，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同志到广东省调研，再次提出，希望广东省在1999年实行高考科目改革试验的意见，并提出要以有利于高校选拔人才、有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有利于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有利于社会稳定为原则，

探索高考科目改革制度。广东省正式接受了这项改革任务。为确保这项改革取得预期效果，广东省招生办公室进行了积极认真的准备，深入调查，仔细研究，听取中学、高校及基础教育主管部门的意见。并于1998年4月制订了两套改革方案。即“3+综合”科目改革方案和“3+X”科目改革方案，报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省政府在听取多方面意见后批准了“3+X”的改革方案。教育部于1998年6月24日正式批复广东省从1999年起进行普通高考科目改革试验。广东省招生办公室1998年6月底正式向社会公布实施“3+X”改革方案。

“3+X”改革方案公布后，在社会引起较大反响。高校招生专业考试科目的组合、分数线的划分以及投档原则、录取操作等成为人们关心的热门话题，特别是中学出现了一些心理骚动。1998年10月，广东省招生办公室在反复征求高校的意见后，制定了《1999年广东省普通高考招生专业考试科目表》和《广东省1999年普通高考科目改革的有关操作方案》，该操作方案对考生选报志愿要求、高校选考科目及分数线的划定原则、投档和录取原则等作出明确规定。至此，“3+X”改革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操作方案。处于备考阶段的中学经过一段议论之后，高三年级的教学活动也稳定下来。一年多的调查研究过程，是逐步提高认识、使思路逐渐明朗的过程。大家对高考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实行“3+X”改革的必要性有了共识。

三、“3+X”改革的内涵与本质

“3+X”改革方案的最大特点是开放性。一方面，中学所修九门文化课全部开考，高校可以根据学校的办学水平和学科专业的特点，自主选择考试科目；另一方面，考生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特长和能力选择相应的考试科目。“3+X”的“3”沿用了“3+2”的“3”，即语文、数学、外语，不同的是数学不再分文理科，所有考生都考同一份试卷。之所以沿用“3”科，是因为经过充分论证，我们认为这三个科目符合学科的相关性，符合形象思维、逻辑思维训练的必要性，符合现代社会交流的要求，基本满足高校测试新生综合文化素质和知识运用能力的基本素质要求，能为普通高校所接受。

“3+X”同“3+2”相比较，格局变化不大，但却有本质的区别。第一，是“3+X”的开放性，将中学所修的九个科目全部开考。“X”选什么、考什么，由高校和考生决定。高校与考生是一种直接双向选择的关系，而非用行政手段指定招什么、考什么。第二，“3+X”打破了“3+2”的文理界限，考生可以跨类报考。在“3+2”模式中，考文、考理，

考生只能两选一，而实行“ $3+X$ ”，考生不再受限制，只要有能力，可以“鱼与熊掌，两者兼得”，进行跨类报考，使有能力的考生得到充分的发挥。第三，“ X ”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可视素质教育的需要增加它的内容。第四，“ $3+X$ ”进一步扩大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是“使高等学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在招生工作中的具体体现。第五，“ $3+X$ ”比“ $3+2$ ”能更好地推动中学教学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 $3+2$ ”使中学过早地进行文理分班教学，影响中学生的知识结构。实行“ $3+X$ ”，取消了中学的文理分班教育，转变了中学的教学观念，有效地推动中学开展以“提高全面素质”为目标的教学活动。

四、走出“ $3+X$ ”改革的误区

“ $3+X$ ”改革方案实施后，其良好效应初见端倪：对于高校，在办学自主权方面迈出了重大步伐；对于中学教育，为改革原有的教学模式提供了有利契机，推动了高中必修、选修、活动三大块课程的开设和推广。

但是，全面正确地理解和实行“ $3+X$ ”改革，必须走出三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 $3+X$ ”改革使中学生更加偏科。

有的人认为，高校选考什么，中学就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原来考“ $3+2$ ”，还只是偏文偏理两类，而现在考“ $3+X$ ”，使偏科现象更加严重。有的中学甚至在高一就开始按科类分班教学，而有的学生则声称，只学自己要考的科目，其他科目不上课、不学习。这些问题的出现，不能完全归咎于高考，更不能依靠高考来解决。高考的首要功能是为高校选拔优秀人才。高考有高考的任务，中学有中学教学的任务。不能把中学要承担的任务、解决的问题依赖高考来解决。我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指出：“基础教育要通过课程、考试和督导评估制度的改革，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实现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的转变，把重点放到提高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心心理素质上。”可见，中学教育的重点并不是为了向高一级的学校输送人才，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学生。因此，偏科问题能否解决，主要看中学能否正确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能否严格执行中学教学计划。当然，由于高考对中学教育的导向作用依然存在，在探索高考科目设置时，要尽量削弱其对中学教育的负面影响，切实做到有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有利于中学生知识结构的完整。

第二个误区：“ $3+X$ ”改革要考虑减轻学生负担。

高考既然是一种选拔性的功能考试，必然存在竞争。学生学业负担重，实际上是一种升学压力大的具体体现。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高等教育的发展仍远未能满足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在同龄人的高校入学率还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在我国“儒家”文化传统观念影响和现实社会实行的人事制度、户籍制度以及就业、提干“唯文凭论”倾向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通过上大学寻求更好的出路依然是学生学习的原动力。在目前的条件下，想单靠高考科目改革来达到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的目的只不过是一种奢望。无论是考“3+1”还是考“3+X”，对于学生来说，要在竞争中获胜，其付出的精力和时间是一样的。不可否认，少考一科，在精神上会有一种轻松的感觉，但实际上只是一种“心理安慰”、一种心理调节而已。只有随着经济发展，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大幅度增加，高等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使同龄人的入学率提高，供需矛盾缓和，适当减轻学生的负担才成为可能。

第三个误区：“3+X”等于“3+1”。

从“3+X”改革方案实施一段时间的情况来看，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和研究。许多高校，即使是一些重点大学，在选择“X”考试科目时，过多地考虑生源的竞争，而对人才的文化知识结构、专业、学科特点需要考虑较少，只选择一门科目。一些较著名的高校原计划选择两门科目，但在获知同类高校只选一门科目后，也打了“退堂鼓”。1999年476所在粤招生的普通高校（专业）选考两门的只有53所，仅占12%。这在客观上产生了“3+X”就是“3+1”的误导。一些中学在引导学生选考时，公开声称“3+X”就是“3+1”，动员学生选考一门，甚至禁止学生选报两门。有的中学校长认为，考一门比考两门更容易上线，因而按“3+1”实行分班教学。必须明确指出：“3+X”不是“3+1”，“3+1”不过是“3+X”的一种形式。当前，高考对中学教育仍具有较大的导向作用。高校选择科目，不但要利于选择人才，要考虑学科建设和创新人才的培养，而且也要给基础教育一个好的导向。也就是说，要注意把有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与有助于高校选拔人才统一起来，更合理、更科学地选择考试科目。为避免偏离改革宗旨的现象发生，在以后的高考科目的改革中，可以考虑将重点本科院校与一般本科院校，或本科院校（专业）与专科院校（专业）的考试科目在数量上加以区别，对重点本科院校或本科院校统一规定选择两门以上的考试科目，也可以考虑增加开设文科综合、理科综合考试科目。而中学教学则应实实在在地全面贯彻教育方针，严格按照基础教育的要求，组织教学活动。这样，在面对“X”这个变量时，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3+X”改革，是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对教育

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它同其他任何改革一样，也有不足之处，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不断完善。2000年，广东省对“3+X”方案进行了修改，增加了指定选考的综合能力测试。广东省教育厅为此专门成立了广东省普通高考综合能力测试课题研究组，开展对综合能力测试的研究，并将其纳入教育部考试中心教育考试“十五”科研课题。经过五年的研究，该课题完满结题，现将研究成果集结出版，希望以其作为切入口，发动大家对高考改革进行深入的讨论，促进广东省考试改革的发展。

刘育民

2006年3月



目 录

高考综合能力测试研究的意义和内容	(1)
一、研究提出的背景	(1)
二、研究的意义	(2)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2)
四、研究目标和内容	(3)
五、研究方法	(4)
高考综合能力测试的历史背景与发展方向	(5)
一、高考综合能力测试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5)
二、我国文理综合能力测试的特点	(8)
三、文理综合能力测试存在的问题和改革发展方向	(11)
国外综合能力测试的实施及与我国综合能力测试的比较	(13)
一、若干国家大学入学考试中综合能力测试实施模式	(14)
二、美国 ACT 科学推理测试分析	(19)
三、我国台湾地区大学入学综合能力测试	(28)
四、国外及我国综合能力测试的启示	(33)
高考综合能力测试的理论模型	(40)
一、综合能力测试的功能和地位	(40)
二、高考综合能力测试试题的特点	(42)
三、综合能力考试的理论模型	(42)
四、综合能力测试的操作性问题	(46)
综合能力测试的核心要素	(49)
一、综合能力测试的综合性	(49)
二、综合能力测试的知识覆盖面	(50)
三、综合能力测试的公平性	(51)
大综合的综合能力测试优势与教育观念	(53)
一、从理论上看	(53)
二、从教育调查的结果看	(53)
三、从教育实践上看	(54)
四、大综合考试与教育观念	(54)

高考综合能力测试与中学教学的关系	(57)
一、高考综合能力测试与中学课程的关系	(57)
二、高考综合能力测试与研究性学习的关系	(57)
三、高考综合能力测试与中学备考的关系	(58)
四、高考综合能力测试与基础教育改革的关系	(60)
广东省高考综合能力测试实施研究	(61)
一、广东省综合能力测试的内容与形式	(62)
二、综合能力测试对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影响	(65)
三、广东省综合能力测试的反思与发展	(66)
广东省高考综合能力测试调查与分析	(69)
一、问题的提出	(69)
二、调研质量控制与分析	(69)
三、研究结果	(71)
四、对高考综合能力测试的建议	(94)
附件	(96)
一、高考综合能力测试研究问卷调查方案和实施要求	(96)
二、高考综合能力测试调查问卷 A	(98)
三、高考综合能力测试调查问卷 A 卷的内容体系	(105)
四、高考综合能力测试调查问卷 B	(106)
五、高考综合能力测试调查问卷 B 卷的内容体系	(114)
六、高考综合能力测试调查问卷 C	(115)
七、高考综合能力测试调查问卷 C 卷的内容体系	(122)
八、高考综合能力测试调查问卷 D	(123)
九、高考综合能力测试调查问卷 D 卷的内容体系	(130)
十、高考综合能力测试调查问卷统计结果	(131)
参考文献	(169)
附录	(171)
关于下达全国教育考试“十五”科研课题的通知	(171)
教育部考试中心课题结题证书	(172)
专家鉴定意见	(173)
课题鉴定组成员名单	(174)
《高考综合能力测试研究》课题组成员名单	(174)
后记	(175)

高考综合能力测试研究的意义和内容

一、研究提出的背景

人类进入21世纪，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各种新发现、新思想、新概念、新方法不断涌现，学科间的相互交叉、渗透及综合化趋势日益增强。社会的发展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教育能够培养出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和学会生存的具有创新精神的综合性人才。为了适应未来国际社会激烈的竞争，我国的教育事业进行了深刻的变革。在一系列教育制度改革中，高考改革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教育部首先在部分省市成功地进行了保送生综合能力测试试点，为综合能力测试的实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1999年，在高考改革中推出了“3+X”高考科目改革（以下简称“3+X”改革）方案，并率先在广东省试行。2000年，“3+X”改革方案扩大到广东、浙江、江苏、山西和吉林五省，并在广东省增设了综合能力测试。2001年，全国18个省市也实行了“3+X”改革方案。教育部在2002年向全国推广“3+X”改革方案。

高考综合能力测试作为“3+X”改革方案中新增加的考试项目，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设置高考综合能力测试的目的是打破传统的封闭的学科观念，在考查学科能力的同时，向考查跨学科的综合能力迈出步伐，开辟创新意识的培养、创造型人才塑造的考试新路。综合能力测试的这种旨意受到师生的普遍认可，然而如何在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上真正体现这种旨意、如何使这种旨意有效地引导日常教学是人们更为关注的方面。我国对高考综合能力测试这一科目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非常缺乏。这一科目如何开展，其试题的内容、难度、考试方式、评价方法以及国外和我国港、台地区对综合能力测试的经验等都需要进一步研究，以使其更科学，更符合我国基础教育的情况，更能发挥对基础教育的指导作用。因此，广东省教育厅和广东省考试中心设立这一研究课题，采取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结合的办法，结合目前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与评价方法，力求在科学性、应用性、可行性上进行研究。



二、研究的意义

(一) 理论意义

综合能力测试是我国高考改革中的新生事物，试题的设计和编制不像其他学科那样有比较成熟的理论基础，仍然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目前，我国大综合、小综合能力测试和一些发达国家的综合能力测试，试卷结构大多是各个学科的拼盘组合，其致命的弱点是试卷结构缺乏完整性。综合科目作为单独的一门“学科”独立命题，却缺少本学科所特有的综合的完整的命题理论。因此，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深入研究综合能力测试试题的编制原理与技术，包括题型的设置、试卷整体性编排、试题内容、综合能力测试目标的评价等问题，从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综合能力测试试题编制理论，对于完善我国高考理论，提高我国高考命题的质量，促进高考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 实践意义

有利于推进课程改革的实施。考试作为教学的终端环节，是整个教学过程的“指挥棒”，其导向作用不言而喻。开展新课程实验理念下综合能力测试的研究，使综合能力测试的命题更科学、更可行，能体现和落实新课程理念，引导各基本学科以及研究性学习在日常的教学过程真正落实和践行新课程理念，从而推动新课程改革的顺利实施。

有利于推进高考改革的进一步发展。随着高考改革的不断推进，高考模式不断丰富，“3 + X”改革作为重要的模式之一，已逐渐在全国展开。但是高考改革仅有考试模式的不断丰富是不够的。要使得高考改革在现有的基础更上一层楼，就必须要在考试命题方面寻找突破口。开展综合能力测试的研究，提高高考命题的质量，有利于推进高考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许多发达国家都比较侧重学生综合能力的考查，在大学入学考试中设置综合能力测试性质考试的历史也比较长。例如，美国的 ACT 科学推理测试，日本的社会学科和理科考试，韩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科考试等。国外考查综合能力的试题注重与社会生活的联系，通过在现实生活中选取问题作为情境考查学生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注重用图表数据的形式